

蔣黨眞相

翊勳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定價 0.35 元

蔣　黨　眞　相

翊　勳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三聯書店

真 相

勵 勵 著

*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(北京東德布胡同十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6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書號：1130·787×1092郵1/32·3 $\frac{7}{8}$ 印張·82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0,000 定價：(6)0.35元

前　　言

“蔣黨內幕”在“新華文摘”陸續發表之後，聽說要印成單行本。“內幕”兩個字是寫了第一節時隨便裝上去的，如作為“Inside……”解釋，像根室的“歐洲內幕”那樣，這也可以叫做“內幕”；但咱們中國的習慣，一提到“內幕”，似乎應該是“此中人語”，必須暴露許多外人完全不知道的秘密事情才對；而我所寫的許多故事，則都是有很多人知道的，現在看起來，雖有一部分像是秘密，而在當時當地則是公開的秘密，不過沒有在報紙上公開刊載而已，而另一部分則是完全公開的。所以在出單行本的時候，不得不把“內幕”兩字改去，而用“蔣黨真相”，以免某些讀者誤會而失望。

開始寫這小東西的時候，手頭毫無參考資料，完全憑記憶，究竟能寫多少，毫無把握。後來有空即寫。寫好即送給書店，居然積起來有七、八萬字，實出於意外。但正因為是“泥蘿葡萄逐段拔”的緣故，有些先緊後鬆，顯得輕重多寡不勻。

十餘年來，常搜集近代歷史事件與重要人物的資料。抗日戰爭時期曾搜集過幾百個名人的出身、發展經過與態度，一百多個資本家的資本累積過程；常想假以時日，能整理出一些規律或系統來，為專門作研究工作的學者提供些有用的材料。在上海、在香港，經過三次的大變，三次都丟得一乾二淨。到解放區之後，舊的材料既無從搜集，又因解放戰爭的空前劇烈，書籍報紙也常精簡到一無所有。因此這裏所寫

的都是憑個人一時的記憶，沒有任何資料可以參考，錯誤（尤其是時間先後）一定不少。但這裏面沒有一句話是我添造的，只有脫漏（憑腦子無法記得完全），而決沒有絲毫增加；只有記錯（如一件事情中有一兩個人的姓名搞錯），而決沒有絲毫捏造；寫在括弧裏的文句，可能有語氣輕重或詳略的出入，但大體上是這樣的。對於記憶中已很模糊的事情，不論如何重大，我都沒有寫。希望各地讀者對錯誤、脫漏之處加以指正。

翊 勳 一九四八·五·二六

再版附言

這本小冊子從一九四八年出版之後，獲得不少讀者的重視，在一年半中間，各地書店翻印的數量相當多。一九四九年冬和一九五〇年春，曾經有一些朋友鼓勵我進行修訂，並繼續寫下去，我可一直沒有動手。事情忙當然是一個原因，更重要的是個人認為這種見聞雜記，如果有些用處的話，既已印行了許多萬冊，沒有再印行的必要了。因為經過一番研究和分析，其中可供研究和學習現代史者參考的材料是極少的。

四五年來，不少讀者來信希望再印，為滿足這些讀者的需要，作了一些必要的刪改，章節次序重新排列一下，內容仍和第一版相同。

一九五四·九·一五

目 次

一、蔣賊的真本領.....	7
獨得曾國藩的嫡傳(7) “精神感召”(10) “揮金如土，一錢如命”(11) 陰謀起家(14) 第一個升降機——“左派”、右派(17) 流氓本色(21) 第二個升降機——“黨統”與軍閥(27) “分而治之”——縱的割據(31) “下詔罪人，破格用已”(35)	
二、蔣賊的軍事幫手.....	39
何應欽(39) 陳誠(42) 胡宗南(45) 白崇禧(46)	
三、特務組織.....	50
C C 團(50) C C 要角(55) 藍衣社(60) 賀衷塞、鄧文儀和康澤(63) 暗殺專家戴笠(65) 蔣經國的“新太子派”(71)	
四、宋孔財閥.....	74
宋子文和孔祥熙(74) 宋子文的理財術(77) “法幣”與“外匯”(86) 孔祥熙的發財法(91)	
五、其他派別.....	96
政學系(96) 英美派(104) “夫人派”(113) 孫科派(115) 元老派(119) 李宗仁(122)	

一、蔣賊的真本領

在中國近代封建軍閥統治全國的歷史中，蔣介石是非常突出的。袁世凱憑藉他的兵力和權謀，盜竊國政，先後不到五年，段祺瑞時起時落，合起來還不到四年，吳佩孚、曹錕則不到兩年，而蔣介石却維持他的專制獨裁統治達二十年以上（一九二七——一九四九）。蔣賊介石究竟有什麼本領呢？下面就加以敘述：

獨得曾國藩的嫡傳

湘鄉曾國藩幫助滿清皇室屠殺人民，諂媚英法等帝國主義，罪惡滔天，是大効子手、大漢奸。辛亥革命以後，早有定論。不料過了十餘年，這位諂媚異族、屠殺同胞的“英雄”忽然又交起好運，蔣介石把曾國藩捧上三十三天，不論治軍、治家，處處奉“曾文正公”為規臬：在鄂、豫、皖、湘、贛“剿共”的時候，曾大量印行“曾胡治兵語錄”，頒發給他的部下研究；提倡“禮義廉恥”的“新生活運動”，更是根據曾國藩“原才”一文的理論——在一、二人的倡導下，可以使天下移風易俗，撥亂為治；抗戰時期，蔣經國在贛州，每兩星期必須寫一封長信給他，而且一定要寫楷書，這是刻意模仿曾國藩家書，尤其明顯。

蔣介石為什麼這樣崇拜曾國藩呢？除去“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”，臭味相投的一般性原因之外，特別是因為曾國藩

是中國軍閥建軍的祖宗（在曾國藩之前，正規軍爲綠營，是統一的，他創始了湘軍，才接着產生李鴻章的淮軍，後來才有袁世凱的北洋軍），他的治兵方術是反人民軍隊唯一有效的辦法。這一點，蔣介石的老師段祺瑞和他的“太先生”袁世凱，都沒有蔣介石那樣體會得深刻。

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辦團練，招募一大批農民，爲保衛地主豪紳的利益與另外的一批農民作戰，這件事已不大好辦，後來“率領湘勇出省殺賊”，當然更不好辦——在本地時還可以用“保衛家鄉”（實際是保衛地主）的口號騙人，出省就不能再用了，而打仗是要拚命的，農民爲什麼肯爲滿清和曾國藩拚命去殺另外一批農民呢？聰明的曾國藩想出了一個欺騙窮人拚命的辦法，就是每打下一個地方，允許官兵大搶幾日，以刺激其士氣。在曾國藩的家書中，他寫給九弟國荃等的信上，常有“想見大索三日”、“大索十日”的詞句。所謂“大索”，名義上是搜索“殘敵”，實際上則是搜索財寶，公開搶劫。搶劫之餘，強姦婦女當然是題中應有之文了。

曾國荃攻入南京時，先鋒爲提督李臣典，照官家文書的記載，李臣典日夜血戰，進城後不久即力竭身死。滿清追念其功績，封世襲子爵。大家都相信李臣典是作戰過勞而死的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，李昌芬同志亡命來投，在我創辦的一個中學裏教書；工餘閒談，始知他是李臣典的曾孫，談起他曾祖的軼事，才知道李臣典的死，是另外一種“過勞力竭”。破城之役，李臣典是辛苦了幾天，破城後接連強姦了兩個婦女，因而致死的。提督是清朝武職中最高的官，本身如此，其部下的紀律就可想而知了！（李昌芬同志於一九二八年夏遭蔣介石的毒手，在南京就義！）

曾國藩、左宗棠等部下湘勇，在各次反人民戰爭中無謂

犧牲的為數甚多，也有極少數官弁以掠殺而升官發財。在舊社會中，窮人的性命最不值錢，死了是沒有人會提到的；而千百之一的發財致富的則為人稱道不置。左宗棠部下有一個姓周的提督，是雇農出身，因挑送地主的禮物在中途賭錢輸去了，就逃到左宗棠部下當兵，在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積“功”升到總兵，回家後成了全縣最大的地主，從縣城到他家近一百里，道路兩旁的田都是他的。

放縱官兵搶掠雖然能够刺激其拚命，打下一個地方，就可以發財；但不能鞏固部隊，因為官兵搶飽了，就想開小差回去，即使不能開小差，有了錢也就不肯拚命。於是曾國藩就想了第二個好方法，叫官兵賭博，在賭博中把兵的錢都騙光了，於是再鼓動他們去打仗。士兵拚命打仗，打勝了好搶老百姓的財寶；搶到後在賭博中被軍官騙去；騙光後再拚命，再搶掠；如此循環不已，湘軍軍官（中國最早的軍閥）就發了大財。

左宗棠是曾國藩一手提拔的（左在湖南巡撫骆秉章處當幕府，因殺樊禎祥的父親，被湖南官紳所彈劾，曾國藩保薦他“才可大用”，反得破格擢升），但左宗棠最不佩服曾國藩，說他太虛偽。左宗棠對曾國荃却很投契，說“曾九是血性男子”。左宗棠曾問國荃：“九帥一生得力之處何在？”曾國荃回答他有兩句話：“殺人如麻，揮金如土！”左宗棠大為佩服。他所揮的金從何而來的呢？當然是帶兵時搶來的、騙來的（曾國荃打下南京後回籍置田百頃）。

曾國藩靠這兩手，才能組織幾十萬軍隊進行反人民戰爭，所以蔣介石要事事模仿，處處崇拜他。

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起，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黨軍隊紀律之壞，有口皆碑，“中央來了一掃光”的民謠遍及全

國。為什麼壞到這樣，因為他得了曾國藩的衣鉢真傳，知道非如此就不能“鼓勵士氣”啊！

“精神感召”

蔣介石一生翻手爲雲，覆手爲雨，權謀超過袁世凱。尤其是削弱地方勢力，成績卓著。其中如山西的閻錫山、四川的劉湘，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，從來沒有人能奈何他們，但碰到了蔣介石，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、土崩瓦解。蔣介石在抗戰之前所辦的廬山“軍官訓練團”，的確收極大的效果，許多地方集團的中級將領（師旅長）到廬山受了幾個月的訓，心就變了，傾向於蔣介石了。蔣介石的嘍囉們說是“由於委員長的人格偉大，他們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，所以心悅誠服地歸向中央”。

蔣介石常常講“精神”和“道德”，而他真正信仰的却是另外一回事。蔣介石的道德如何，是否“足以服人”？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，他究竟用什麼“精神”能“感召”別人去傾向他呢？

據熟悉廬山訓練團內幕的人透露，蔣介石的“精神感召”一般過程是這樣的：

廬山訓練團的教育課程包括蔣介石的訓話在內，都是官樣文章，主要的工作是派許多隱藏的特務分插在各班，了解地方將領的生活、歷史、財產及與地方長官的關係，特別是長官和他的經濟關係，曾經給他發過多少財。到訓練完畢，蔣介石即分批接見受訓的將領，簡單詢問一些部隊的疾苦，說些好話，無非是關心他們，愛護他們，有什麼困難一定代爲解決等等的官面話，這就是所謂“個別訓示”。“個別訓示”之後，受訓將領就要整裝回防了，蔣介石的侍從室就分別有

人去訪問他們，說“委員長特別關心您，所以叫我單獨送些路費”。這一筆路費，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沒有經過手的大數目，對西北軍和晉綏軍一類的窮軍官，數目是十萬元、二十萬元；對四川軍、廣東軍一類的較富庶地區的軍官，則多到八十萬元或一百萬元，這一筆錢甚至要比重收人的全部財產還要多。收受者拆開封套，看到這樣一大數字的支票，不由得神經爲之震驚，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，怎麼看花了！於是他的“精神”就開始被“感召”了！接着再想：“我跟了某某人（原來的長官）十幾年或幾十年，爲他出力拚命，他從來也沒有給我搞到這許多錢；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筆錢，結果大部分被他拿去了，我只落得很少一部分；或者是某一地區是很有出息的，我能駐防一年半年也可得到不少油水，但他一定要調劑別人而不肯調劑我；過去我那一次爲他拚命，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險，他却待我如此吝嗇刻薄，實在太對不起人了！蔣委員長，我沒有爲他做過什麼事，他却送我這許多錢，可見他待部下的厚道！”於是這個人的“精神”之被“感召”，就更深一層！最後回去時，侍從室經手送“路費”的人要介紹一兩位親戚朋友，拜託安插一下，拿到“路費”的將領當然滿口應允，於是隨着特務的打入，日夜宣傳“中央化”的利益及挑撥原來隸屬關係間的惡感，這位將領的“精神”就完全被蔣介石“感召”去了！

這就是蔣介石“精神感召”的全部過程，及其“偉大人格”的具體影響！這就是廬山之所以曾經成爲蔣介石集團的“聖地”的緣故！

“揮金如土，一錢如命”

蔣介石的“精神感召”，已够得上說是“揮金如土”了，但

在蔣介石二十年來所搜刮、所揮霍的數字中僅為“滄海之一粟”。如一九三〇年蔣馮之戰，蔣的嫡系精銳第三師（師長為張治中）、第四師（師長為徐庭璣）幾乎全軍覆滅，蔣介石用陳誠所獻的計策，以一千五百萬元收買韓復榘、石友三兩人叛變，得以轉敗為勝。那時候，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不過兩萬萬元左右，一千五百萬元就佔了十三分之一；那時候，蔣介石自己的軍隊不足三十萬，全年的軍餉只要三千多萬元，一下子就付出等於全年全部軍餉的一半，可見蔣介石用錢用得很慷慨。

一九三六年夏，蔣介石用二千餘萬元收買陳濟棠的空軍，有人計算一下，比買新飛機還要貴三、四倍，說這個買賣犯不着做。蔣介石說：你不會算賬，這個買賣並不吃虧，而是便宜的——我們買一架新飛機，只能抵他一架，現在把他的收買過來，我多一架，他少一架，當然一架要抵兩架的價錢；單有飛機還不中用，一定要有人，訓練一個空軍人員，比買一架飛機的錢還要多，我訓練一個，也只好抵他一個，收買他一個，則我多一個，他少一個，自然一個要頂兩個。因為蔣介石精明到此地步，於是陳濟棠的“天南王”就垮台了。

在抗戰之前，蔣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隊，武器好，服裝好，吃得更好，嫡系軍官還另外有額外補助費，如李延年，就每年要買一輛最新式的美國汽車，一九三六年決不坐一九三五年的汽車，一九三七年一月，就把一九三六年的汽車換掉了，他們的生活比上海的大銀行經理還要闊氣些。錢從哪裏來的呢？大部分是蔣介石給的。（在抗戰以前，蔣介石嫡系軍隊吃空額，侵佔士兵餉銀的風氣還不大，到抗戰第三年，由於物價飛漲，蔣軍軍官才大家從士兵身上打主意，貪污之風比雜牌軍更甚。）

蔣介石的“揮金如土”，已如上述，但這僅是他用錢的一方面，他的另一方面則吝嗇異常，幾幾乎“一錢如命”。

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夜，黃任之先生（炎培）沿津浦鐵路北上旅行，回到上海時對友人說：“在徐州同時看到東北軍五十一軍（于學忠部）和中央軍第二師（黃杰部），兩種軍隊的服裝與生活，真是天壤之別！我如果是東北軍，就非造反不可，實在太氣人了！”蔣介石對待東北軍的苛刻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！

一九三〇年蔣馮戰爭的導火線就是為了待遇不公，那時蔣介石與馮玉祥換過蘭譜不到三年，電報往來，稱兄道弟，馮電蔣質問何以對西北軍（那時稱二集團軍）待遇不公，蔣介石復電申述兩大理由：第一，二集團軍生長西北，向來苦慣的，苦些也不要緊，不妨事；一集團軍（蔣自己統率的）生長東南，就苦不得。第二，二集團軍是馮親自訓練，有刻苦作風，生活苦些無妨；一集團軍就不行。蔣介石還說：過去所以推兄為軍政部長，即希望兄能以西北軍之艱苦作風貫徹於全國軍隊。言外之意，就是說：我的一集團軍所以不能吃苦，必須待遇高些，這個責任就要你馮玉祥負。

果真是因為沒有錢，所以必須苛待西北軍嗎？只要把收買韓復榘、石友三的一千五百萬元給整個西北軍，就足夠西北軍全軍用一整年而有餘，不會再有待遇不公的問題了。

抗日戰爭以後，中央機器廠與中央電氣廠均遷到雲南去，把機器藏在山洞裏生鏽，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技術人員一再建議，稍增一些機件即可製造飛機，那時預算，只要化費一百五十萬元就可以每月製造一架飛機，先搞起來，以後再擴充。三上呈文，蔣介石和宋美齡（航空委員會秘書長）均置之不理。為什麼？因為自己能造，就要少買外國貨；少買

外國貨，就少賺了回佣。

陰謀起家

蔣介石在同盟會時期，幾乎毫無地位，辛亥革命時從日本回滬，與張羣、吳忠信同隸滬軍都督陳其美部下，號稱“團長”。當時陳其美的部下異常龐雜，五花八門，無所不包，上海各色各樣的流氓，大部分都和“楊梅都督”（陳其美的外號）有些淵源，所以都督府的“將軍”多如牛毛，區區校官誰也不放在眼裏。那時共舞台的演員潘月樵、夏月潤、夏月珊兄弟都是“少將”階級（當時共舞台在城內九畝地，後失火，即遷至法租界，在廢墟重建的戲院改名新舞台，到一九二一年前後，潘、夏仍登台演戲），蔣介石那樣的起碼團長，從哪裏數起來也數不到他。一九一三年國民黨反對袁世凱的戰爭失敗以後，蔣介石愈加沉湎於嫖賭徵逐，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北伐，派他做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參謀長（另一粵軍參謀長爲羅翊羣，羅、蔣不分正副，同稱參謀長），蔣也想投機一下，不料一到廣東，就撞上陳炯明叛變，跟了孫中山退到上海，這一下蔣介石就有了政治資本了。

孫中山愛用死人作榜樣以激勵活人，因此陳英士（其美）的姓名常被他和朱執信、鄧仲元一起提及，被誇獎爲“革命功臣”，而蔣介石是陳英士的部下，又是陳英士的同鄉（浙江人），這次又在危難之中跟隨了孫中山，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，孫中山在廣東重振旗鼓，要蔣介石去辦軍官學校，但蔣那時在上海跟着陳果夫（其美之姪）、張靜江、戴季陶（陳其美的湖州同鄉，那時與陳果夫同爲物品交易所經紀人）在交易所“搶搶帽子”（交易所是不費什麼本錢的投機買賣，看價漲先買進，再賣出；看價跌即先

賣出再補進；看準了賺到漲跌的差額，看錯了蝕去差額，不漲不跌貼去交易所手續費。買賣均當場了結，不拖到第二天，交易所的術語爲“搶帽子”），足夠嫖賭耗費，早把“國民革命”拋在九霄雲外。那時廖仲愷先生寫信催他到廣東去，他回信說：“必須有人能像英士那樣原諒，並不時教育，才有信心。”換句話說，他是不守什麼紀律規矩的，乾脆就是不幹。那時他正和長三堂子裏的“倌人”（書寓妓女）陳潔如（宋美齡之前的“蔣夫人”）搞得火熱，把老婆趕回家去。據一九二七年蔣經國給他母親（蔣介石的元配毛氏）的信上說：他（指蔣介石，下同）只顧自己在外嫖賭吃着，不顧家裏妻兒的飢寒，你（指毛氏）規勸他，得到的回答是非罵即打，我親眼看到你在樓梯上端被他一脚踢下，從樓上直滾到樓下，跌得不省人事，他却揚長而去；可見他是殘忍沒有人性的，是典型的下流流氓！

交易所的全盛時代如曇花一現地過去了，張靜江、戴季陶、陳果夫等虧空了一百多萬元，上海站不住腳，只好到廣東去“革命”。靠山大樹倒了，門下食客蔣介石在上海也混不下去，於是請了一次“賴債”酒，說：蔣某到廣東去，如有得法的一天，一定加利奉還，否則來生變牛變狗報答各位。也就帶了陳潔如南下“革命”了。到廣東後又奉命到蘇聯去考察，知道蘇聯真正盡力幫助中國革命，孫中山的事業是有前途的，此“機”大可一“投”，於是在廖仲愷先生的扶助與中國共產黨的全力合作下，辦起黃埔軍官學校，到一九二五年時編了兩團學生軍，參加東征，才初露頭角。但直到討平楊（希閔）、劉（震寰）之後，成立國民政府，還沒有蔣介石的地位。

蔣介石怎樣能一躍而居重要地位——在軍隊中從軍長、總監、總司令，而委員長，在國民黨內從中執委、中常委、